

※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專輯 II ※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系列座談會之三 唐宋文化變遷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蔣宜芳記錄*

時 間：1998年11月6日

地 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衣若芬女士（本所助研究員）

引言人：黃寬重先生（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龔鵬程先生（佛光大學教授兼校長）

衣若芬女士：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歡迎各位抽空蒞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參加本所「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研究計畫第三次座談會，前兩場的座談會，我們分別從「世變與文變」、「末世」以及「地域關懷與時空想像」等方向探討了魏晉南北朝在歷史變局中的文化現象和文學表現，今天，以及12月7日的兩場座談會，時空背景轉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今天的主題是：「唐宋文化變遷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我們都知道，唐代與宋代在文化精神上有相當顯著的差異，而其中的變化因素與演變痕跡一直為學界所重視，今天的座談會，一方面希望從學術研究史的角度，回顧唐宋之際文化變遷歷史的研究情況，重新審視研究的取徑，探討「唐宋變革」這一個議題未來可以開拓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唐宋之際正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的轉型期，世局的變動幅射在文化內涵，展現於文學作品，形成迥異其趣的

* 本所約聘研究助理。

文學風格，我們也可以以唐宋之變古與開新，省思文學史上「世變」與「文學創化」的關係，試想歷史，或者說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是否可能被採取做為解釋文學作品的一種策略，為了能夠較多層面地顧及我們的論題設計，今天特別邀請歷史與文學兩學門的專家，分別從個人不同的專長領域，闡發見解。

接下來，我就為各位介紹今天的兩位引言人，相信各位也都不陌生，首先是本院史語所的黃寬重教授，黃教授精研宋史多年，成績斐然；另一位是佛光大學的校長龔鵬程教授，龔教授的博學大家是有目共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說宋代文學是龔教授的當行，龔教授曾經在大約 1990 年於淡江大學舉辦過「晚唐社會與文化發展」研討會，對於唐宋文化變遷與文學發展具有深厚的見解，因此兩位都是很適合來談這一個主題的學者。

關於座談會的安排，請兩位各講 30 分鐘，引發議題，再請各位提出個人的高見，與引言人共同來思索「唐宋文化變遷」在中國歷史與文學史上的意義。現在就請黃寬重教授先開始。

黃寬重先生：

主席、龔教授、各位女士先生，非常感謝文哲所有這個機會讓我向各位前輩、朋友報告這麼一個比較空泛的題目。當我接到這樣一個題目的時候，心理是相當惶恐的，個人的研究是非常狹窄的專題，很少有機會或環境作一個比較大範圍的討論，所以最近當我相繼受到這樣的邀請時，突然覺得已經老了，我大概要被歸化為脫離專題研究的範圍，這對我個人來說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高興的是有更多的機會向不同領域的朋友請教，但是太早被劃定成高談闊論者似乎也是學習上的宿命。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到非歷史的領域做報告，因為它只是一個歷史性的綜合議題，不曉得對各位有沒有什麼積極性的意義，不過我想這是學科互動、科技整合的好的機會，本院包括史語所一直在強調科技整合，以歷史學者而言，似乎比較注意借用其他社會學科的理論來幫助歷史研究，今天看來這樣的整合是不是有成，還很有斟酌商榷的餘地，然而研究領域彼此接近、同質性更高的人文學科之間，卻好像很少有對話的機會，以前一再強調文史哲不分家的這種觀念其實長久以來是被忽略了。今天由文哲所來推動這樣一個整合性的計劃，對於學歷史的人來講，應有更多的省思，所以，我是抱著跟各位學習，請各位多從不同學科的觀點，給我指教的這種心情來向各位報告。我提供的這份資料，是在史語所七十週年所慶所舉辦「邁向

新學術之路」的學術研討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被指定的時間非常的短。我知道自己雜務多，工作忙，並不希望被安排做一個報告。但是在一個月之前臨時被指定要做一個補白的工作，填補議程上的空白，我只好很匆促的就以往所涉及的、所思考到的問題做一些簡要的回顧，寫成了在各位手上「宋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這麼一篇將近兩萬字的文章。寫這樣的文章，對我來講也是很心虛的，雖然在這之前我也曾寫過幾篇比較專題式的，或者是一般性的論文，討論大陸跟台灣在宋史研究的幾個議題，譬如說大陸學者研究變亂，或者農民起義的問題，大陸學者在宋代典籍文獻整理方面的成績，大陸新出土的人物墓誌在宋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性，以及一篇綜合海峽兩岸宋史研究的動向的文章，總共大概有四、五篇。但是要做一個前後貫穿性的觀察，對我來講還是有相當的困難，因為我一直從事的專題是在南宋的歷史，所以我來要談這麼一個大時代、長時間的歷史的研究，最近以來似乎在中國史研究裡比較熱門的宋史，我的評議、我的思考都未必中肯。而且我的研究與觀察的方向，一直侷限在以制度、典籍、軍事、政治、社會為主的課題，除此之外，我能夠評論的也非常有限，因此我這篇文章存在很多缺點。正因為這樣，所以我想請各位給我多方面的批評和指教。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當然沒有辦法照文章所敘述的方式去做細部的介紹，也不想重複文章內容。我在給貴所提供的大綱，實際上跟我原來的論文是有所不同的，除了前面跟後面可能有相類似之外，我要做的報告大概放在幾個點上面，第一是把宋史研究做一個重點性的回顧，第二在這個回顧之中，比較強調唐宋之變革的討論。不過我到了會場，看到龔鵬程教授所寫的論文裡面對於唐宋歷史的變革做了不少的研究，因此我想把重點再作修正，修正的內容到我報告的時候再做介紹，至於變革論點各家之間的歧異點或者是相似的地方，各位可以參考龔教授的論文。第三點是要介紹宋代幾個專題，也許是跟文學、文化發展有關係的專題研究的發展狀況，包括對士人、對家族、對教育這幾個面向的研究的狀況。最後才做一個很簡單的展望，這個展望當然希望加強文史之間互動的研究。

綜合宋史研究這一百年來的成果，我大致上把它分成三個階段，在我的舊文章其實是把它分成四個階段，那個分法當然有它的意義，不過今天為了節省時間，及進行比較大時段的區分，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民國以後，宋史受到重視或者受到注意以來到 1949 年。第二個階段就從 1950 年到 1980 年。第三個階段是從 1980 年到現在。就新學術的發展方向，以新材料、新工具來進行史學研究對宋代而言是從 1930 年才真正的開始，這當然跟傅斯年、胡適等人所推動的新

的史學研究方法有很密切的關係。而研究宋、遼、金史幾個卓然有成的第一代大家，他們的成名作品就是在這個時候。比較著名的，包括前不久才過世的鄧廣銘教授、現在在新竹的全漢昇教授、1965年辭世的傅樂煥教授，還有在1990年辭世的陳述教授。傅樂煥教授是遼史研究上很有成就的人物；陳述則是在金史方面；鄧廣銘、全漢昇兩人分別在宋代的政治制度、人物以及社會經濟，都是當代中國在這三個領域方面非常重要的大師，這些大師同受到傅斯年、胡適、姚從吾、陳寅恪等人不同程度的影響，開展出跟乾嘉考據傳統不同的新學術。由於他們的努力，使得宋、遼、金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逐漸奠定了基礎。相對於自民國以來即很熱門的漢、唐研究而言，宋代的研究顯然是後起的，而且比較零散。除了前述的幾個人之外，還有聶崇岐、朱希祖等人也都是這個時候成名的學者。他們的作品跟以往有很大的差別：第一是重視問題意識；第二就是更廣泛的利用各種材料來考訂、修訂、增補史實；第三是傾向利用社會科學方法的觀點，尤其以《食貨》半月刊、全漢昇等人為主，他們接受馬列觀點，重視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最後一點，這個時候學者的共同現象就是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所以對宋、遼、金的討論，對宋遼關係，以及宋代危機處理等等都有研究。

到了第二個階段，即1950年以後，是海峽兩岸分歧非常大的時期。這個階段顯然跟兩岸的政局發展有密切的關係。1950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一度積極的鼓勵學術研究跟古籍整理的工作，不過隨後他們就利用馬克斯的理論介入研究，過度強調理論的指導性，傷害到學術研究的求真精神，對於研究者造成極大的壓力，而扭曲了學術的本質。譬如宋代變亂問題的研究。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進行了理論的探討，即所謂的五朵紅花，或者五朵金花的討論，宋代最重要的就是農民革命的問題。我在十年前蒐集到了大概四百多篇文章，從裡面可以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中共政權循著蒐集資料、整理、提供觀點到修正觀點的模式發展，最後強迫學者接受幾個論點，把所有對政權不滿，發動顛覆政權的，都界定為農民革命，而且所謂農民，更明確的說是佃農。因此就用各種方式來替他們定調、定性，最後迫使整個學術完全在八股式的框架之下作研究，因此在文革以後學術界只呈現兩個現象，第一是整理少數以愛國主義為主的文集，譬如主戰的陳亮等的文集是在這個時候整理出版的。另外一個是討論誰是主戰派、主和派、佃農等等的問題。今天來看這些議題都是很有問題的，不僅我們在外面的人看的清楚，大陸的學者也做了非常沉痛的反省，這是大陸方面的發展。臺灣早期也受到政治的壓力，雖然沒有

像中國大陸那麼明顯，但是學者自我束縛的心態蠻清楚的，臺灣的學者不談農民及階級之間矛盾性的問題，特別強調福利、階級和諧的一面，偶而談到一些跟現實政治相違的地方也曾經遭受到一些壓力，最有名的就是林瑞翰教授《中國通史》裡面對岳飛評述的問題，曾經引起極大的政治壓力。這些現象到了 1976 年臺灣當政者對政治環境有了信心以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學術界有較大的空間進行學術討論，再加上幾個大學成立博士班，以及海外學人回來介紹新的理論與方法，讓研究更趨嚴謹。這個時期其實是海峽兩岸最大的分歧點，這也是臺灣在整個學術發展上，在國際漢學研究上具有影響力的一個時段。

到了 1980 年以後，兩岸又有明顯的改變。第一個就是大陸學者逐漸拋棄了以往受政治壓力所引導的研究方向。第二是回歸到比較傳統的歷史的探索方式；這種的回歸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在典籍整理、人物研究、政治制度等方面，都有不錯的成績。由於整個環境改變，臺灣跟大陸的研究已由分歧而傾向合流的趨勢。這趨勢在大環境的變動之中，具有互補的作用，但是對臺灣的研究者也形成新的壓力，我們以後如何在強力競爭中，發展出具有優勢的論題，也就是如何創造一個局部優勢，是值得我們多加深思的。臺灣的學者少，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所有的領域都要強出頭，因此如何匯集有限的人力，發揚現有的優勢，也就是加強論點的嚴謹、論證的過程，以及對於研究史的回顧等方面，但是以後如何走，恐怕更需要進一步的討論，這一點我會在結論裡面再介紹。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簡略的介紹宋史研究中唐宋變革的討論。龔鵬程教授的文章裡面已經做了大略的介紹，我現在只是做一個增補，或者突顯某一些重點而已。龔教授的文章裡面介紹到中國學者、日本學者的看法，也評述臺灣學者在這方面的缺點，這裡我只補充一個說法、一個論點，就是劉子健教授所提出來的看法：劉教授也同意唐宋是一個大的變動時期，不過他覺得整個變革不是從唐中期到北宋就完成了，其中有很多部分一直到南宋才進一步發展，他曾寫了一篇名為〈略論南宋的重要性〉的文章，舉例說明很多中國文化或歷史的變遷，到南宋時期才定型。譬如南方的開發，海外的發展，官僚政治的成形等等，都不應該從北宋就斷掉。這是以往學者的研究太偏重北宋，對南宋的了解不足所致。除了南宋外，我覺得唐末五代還值得注意。

在討論唐宋變革時，研究文學史或是思想史的人較強調理學、文學的發展，但在這個轉變背後的政治、學術因素，也值得注意，才有助於了解這一批人是怎麼起來的。可惜，到目前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很分散，沒有人作個整體的研究；如果有

人願意作更整體的、更歷史面的研究，也許也可以解決更多文學或文化史上的問題。在此，我願意介紹劉靜貞教授的一本書：《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這本書是介紹太祖、太宗、真宗到仁宗朝，整個政治權力的轉移、君臣互動、君權、相權轉折中，士大夫的力量怎樣形成，透過士大夫力量凝聚的過程，或有助於了解新儒學運動的產生。此外，這幾天我重新溫習新、舊文獻，覺得唐宋變革之間，有一個值得重視的意義，即是歷史傳承與變化的時空的因素。這個因素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儒學復興運動跟士大夫有密切的關係，理學跟文學的發展也值得我們重視，但是新儒家或者是新型的士人的興起，卻是推動這一連串變化的重要力量與因素。然而，這樣的因素跟整個北宋初期的環境有密切關係，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能簡單的介紹：第一就是科舉所帶動的影響。科舉帶動了什麼樣的影響呢？在宋代政府重文輕武的宣示下，科舉錄取的名額大量增加，在西元 1000 年左右，曾經一次錄取了一千多人，這是史無前例的變革，這一來，使大量的文人投入政治，形成一個新興的勢力，這些進士是經過殿試入仕的，每一個人都自覺是天子門生，這樣一個觀念有利於塑造尊王風氣，以及士人的社會責任感。如此大環境的變動對於文士風氣的養成有很大的幫助。這些大的變化與宋內部的政治變化及外患也有密切的關係。內部的政治變化發生於真宗到仁宗之間。真宗原想學他的父親太宗，但是能力不足，最後因他的身體不好，便由他的皇后劉氏代理他的皇權，以致相權在代理皇權跟皇權之間的形成新的互動與產生政治鬥爭。真宗死後，仁宗是在劉太后攝政之下處理政事，整個朝政形成一部份環繞太后，一部份以皇帝為主的兩個中心。這時候以范仲淹為中心的新興的知識份子，強調皇權的重要，支持仁宗，這些人對舊的官僚及宰相提出批判，這種批判其實代表一種新舊傳統的衝撞。從五代到宋代，士大夫因科舉崛起，逐漸產生不同的傳統與責任感，另外也與南北經濟發展差異有關。與此同時，宋朝又面臨了遼、夏的威脅，宋人在如何應付外來的威脅時，面臨了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有的主張恢復，有的主張弭兵，相互爭辯，卻逐漸出現正統論和德勝於威的論點。在內外環境變化下，士人更想檢討整個時代及推動國內政治的變革，在政壇上、官僚體制上也逐漸產生影響性，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主管軍事的樞密使，在宋真宗澶淵之盟以前大部分都是武將，澶淵之盟後則多是文人，而且在宋代強調文治的情況之下，被推崇的武將都是在武功之外更重視文德，像曹彬這個家族之所以受到宋朝的重視，正是在整個重文輕武的風氣下塑造成的，所以一個武將如何在朝廷中維持他的關係和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些現象，都是觀

察、了解北宋中期以來很多政治變動的重要因素。目前學界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時候，比較注意社會文化、健康疾病或者是婦女、兩性關係、宗教等問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有些時候不妨回歸政治再作思考，因為政治事件、政局變化所帶動的影響，恐怕即使是明顯多元化的現代人也是不能忽略的，何況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面。因為時間關係，我沒有把幾年來跟一些學者一起推動的家族研究說明清楚，實在非常抱歉。

最後我做一個很簡單的結論，第一，我覺得學科之間的互動應該增強，這個增強不只是在理論的介紹或引用上而已，學科之間的互相觀摩、互相的憑藉是一個了解的開始，今天我們談科技整合，並不是很切合實際的說法，不如從加強對話、合作開始，科技之間恐怕要待有了對話以後，才有所謂的整合，沒有對話，就談不上任何整合，所以我很期待包括院內、院外的同仁都有更多的機會來了解學科的異同，推動一些新的研究議題，大家不妨從不同面向來思考共同關切的問題。我想科舉考試在中國實施了一千多年，影響的層面非常深遠，已經不是一個歷史的領域所能做的研究，如果能夠結合歷史、社會、文化、文學、思想等學者一齊投入這樣一個議題的研究，相信會讓我們更全面的了解科舉考試對中國深層的影響。此外，教育也是一個好的議題，值得從事不同學科的人共同研究，進行更深的了解跟互動。第二，就是電子文獻的重要。在未來的發展裡面，人文學科恐怕免不了要借用電子文獻資料，這一方面我覺得臺灣是優勢，可是再過五年、十年，臺灣就要面臨嚴峻的挑戰了。不論如何，作為一個人文學者，如果不會運用大量的資料庫的話，研究的優勢可能會被國外的漢學家所掌握，你可以在一、二秒中檢索二十五史中你所設定的詞彙，讓你博學於一瞬間，這其中當然有它的危險性，但是在面臨新的挑戰的時候，大家不要忘了這也是一個研究的利器。第三，就是新方向、新議題的發展，對我們是相當重要的。簡單的說，在臺灣面對國際漢學界，以及大陸學者的壓力之下，如何創造一個局部的優勢，讓臺灣在漢學界繼續保有我們的研究的成果，更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因為時間的關係，就講到這裡。我提的都是不成熟的意見，請各位指教，也很抱歉耽誤了各位好多時間，謝謝！

衣若芬女士：

謝謝黃教授，我們請龔教授發言。

龔鵬程先生：

主持人、各位朋友，剛剛聽了黃教授的講法，我想大家對於宋代的研究一定有一些非常精要的想法，不過剛剛聽他一開始就講，我們今天的題目「唐宋文化變遷的研究」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驗，因為他從來不談這麼空泛的問題，他比較專注的在做一些專題的研究，我跟他剛好不太一樣，我最喜歡題談這些大的問題，用原來為陳石遺所創造，而後來被錢鍾書經常拿來使用的一個術語來說，叫做「大判斷跟小結裏」，所謂小結裏就是在小地方考慮繩子怎麼紮的；另外一種則是談大判斷，就是談對整個事情有一個大的看法。我喜歡凡事先看大判斷。我的想法是：細部的東西一定要放在脈絡裡面才能認識，例如我打你一拳，沒有從脈絡上來看根本不知道這拳是什麼意思，所以大判斷我想是必要的。當然這跟現在史學界一般的作風及作法不很一樣，但是我覺得大判斷在目前的研究上其實有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剛剛黃先生又說現在我們應掌握電子文獻、電子媒體，我自己的研究從來不用這些，我向來不用！從來不做卡片、沒有筆記、也沒有任何札記、也不使用工具書、不上圖書館。我寫文章從來不用工具書裡面的資料。可見做學問的方式很多，非常複雜。像我這樣，也不妨視為一格。但這些都是題外話，就這個題目來看，我現在要談的還是把它放在一個脈絡上來說，就是整個唐宋文化變遷這個議題之所以出現，它涉及到一個基本的史學觀念上的重大改變，早期，中國人講歷史的觀念叫「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史記》以來，即強調「通古今之變」這個講法。但是「通古今之變」的講法到唐代劉知幾的時候，已經確定出現一個新的觀念，即「斷代史」的觀念。我們常常順著劉知幾的想法把斷代史往上推，推到《漢書》，以《漢書》作為《史記》的一個對立面，一個是代表通史，一個是代表斷代史。可是我們忘記了《漢書》其實並不是斷代史，如果《漢書》是斷代為史，我請問我們要怎麼去解釋《漢書》的〈古今人表〉？〈古今人表〉裏孔子、老子這些人通通在裡面，換句話說，《漢書》原本是延續《史記》所談的一些問題來修的，所以《史記》既已經修到漢代了，它就從這些地方往下講，但是前面有一些他覺得可以補的就追上去繼續補，但是到了六朝的中期以後，開始出現叫做「國史」這個觀念，一個朝代隨著政權的改變出現朝代史，然後出現國史，建立國史館，而出現國史的斷限的問題（就是一個朝代史到底最上端要什麼時候開始，最下端又要修到什麼時候）。本來歷史是時間的長流，沒辦法斷開的，但是我們現在要用一個人為的方式把它斷開，斷開以後出現斷代史這個大傳統，這是後來形成中國所謂的正史、國史

的基本結構。從通史到斷代史，這是兩個不同的處理歷史的觀念和方法。從通史的角度講，我們會比較注重所謂通古今之變，強調它的變動部分；強調國史的時候，它則是較為穩定的，替這個時代的整個過程做一個比較清楚的處理。但是國史通常不會再去處理它跟前朝之間轉變上的各種問題跟關係。在這兩種觀念之外，近代西方史學觀念引進中國以後，我們又出現第三個不同的處理方式，就是所謂的分期說，這個分期說當然主要就是指古代、近代、中古近代、現代等這樣的分期。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別的分期法，舉個例子，考古學上的分期，就有新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青銅時代之分，青銅時代就不是一個朝代的觀念，青銅時代可能包括了以前所謂的夏、商、周時代，而石器時代也是一樣。用一個時代可能概括了若干的王朝、若干的政權，這個時代跟政權之間是不相吻合的，所以一個時代它可能概括了一個朝或者兩個朝，或者上面這個朝的一半，下面這個朝的一半等等。這三種分期法，前面兩種是中國本身發展出來的。西方的分期法，則從羅馬時期的史學家開始被運用。因為西方原先也是分國分區的歷史，後來才用基督教的神學觀念來做這樣的概括，例如我們現在所用的西元史學紀年基本上就是由此形成的。這樣的觀念到了近代當然有基本上的變化，馬克思將歷史分成五個階段，形成一個新的講法。其說在民國初年被介紹到中國以後，對於中國的史學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們很多人採用這樣的分期法，重新來處理中國的歷史。運用的情況，大概有三個脈絡：第一個是民國十七年開始的社會史論戰；第二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大陸史學界的分期；第三是日本學界根據馬克思所衍生的一些分期概念。

民國十七年開始的社會史論戰，是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以後運用到史學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處理，大家在討論這樣的一個歷史分期到底適不適用於中國的歷史解釋之同時，又有一個現實意義，可以具體說明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到民國初年，到底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階段、處在什麼樣的社會性質上。這個確認有助於思考在革命道路到底該選擇什麼策略，所以有它現實上的意義。因此之故，在當時參與討論的人非常多。第二個脈絡，就是中共取得政權以後，延續以上的論述，繼續把馬克思的討論深化。第三個是日本學界根據馬克思而結合「上古、中古、近代」這個分法來談的。在民國十七年開始討論的時候，它比較偏重的是解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到底是起於什麼時候，結束於什麼時候。封建社會以後跨入到資本主義階段到底是什麼時代。中國當時到底算不算是一個資本主義時代？如果算是資本主義時代，孫中山的革命算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話，那麼資產階級革命從辛亥革命以後，到中共崛起

以後這一段就算資本主義，後面則算是社會主義階段，所以他們早期的研究比較著重封建社會的部分。到了三十八年以後，大陸史學界則花了較多力氣在追問：中國社會在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期之後，有沒有一個奴隸社會的時期？中國的奴隸社會跟西方的奴隸社會到底一不一樣？殺人殉葬，死的這些人到底是不是奴隸？奴隸跟奴隸主的關係是怎麼樣？孔子是不是一個為奴隸主辯護人？這些討論成為當時史學上的重點。

在日本學界的討論裏，當然這些問題也有一些討論，但是我覺得它更多的是談中古這一個階段到底是算在什麼時候。中古是算六朝到唐代這一段呢？還是要往後算到宋代以後呢？到底中古要怎麼算？近代從什麼時候開始？目前我們大部分人採用的講法，一般就是說漢代以前大概算古代，鬆散的說嘍！魏晉到隋唐這一段大概就算中古，我們文學界或史學界開的中古史課程，或者我們看王瑤的《中古文學史》，或是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大概即含括這一段，就是所謂六朝文學，或者是魏晉包括到隋唐這一段。但如果這樣看，所謂的近世史這就比較難說了，近世到底是從宋代算起呢？還是要從明朝末年、明清變革期這時候開始算？或是要到鴉片戰爭後才算近代？史學界和文學界在這方面都沒有共識。我們一般都是比較鬆散的處理。

日本史學界在唐宋變革期的處理比較集中，材料也比較多，大概針對幾個方面：從政治上來看，就討論到君主權力的升降、士人地位的改變，還有士人跟君主的關係，譬如剛剛黃先生講到士人跟君主之間的關係。經濟上來看，當均田制鬆動，到宋代以後，相關的地主、佃農、自由人、農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變動如何？還有，因為人跟土地的關係不同，所可能產生的人的精神狀態，或者經濟活動也不一樣。而且在唐朝那個階段是實務經濟，宋代以後是貨幣經濟，經濟型態不一樣，商業發展更不相同，因為商業發展的不同，也可能會讓我們注意到市民文化、市井文化的興起。同時我們也知道唐宋的城市結構就不一樣，因為唐代坊市制度破壞了，人民流動性比較大，到了宋代就不一樣。當然在民國十七年或是大陸的學界跟日本的學界，這方面的討論很多。相對來講，在臺灣的討論就不是那麼多，臺灣當然有一些延續，像陶希聖先生（包括他的《食貨雜誌》就是），陶先生本身就參加過民國十七年的社會史論戰，他後來也有一些延續的講法，除了陶先生這一條路線之外，另外就是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唐代後期的變動，這一部份的討論基本上不太談到宋代，因為這些問題是陳寅恪先生所帶出來的，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

述論稿》裡面討論到唐代政治上的變動，主要是統治階層門第社會，還有統治階層的組成跟權力結構的變動，從門第的社會轉移到科舉出現的新興文人階層等等。他認為，這樣的變動帶動了唐代後期的轉變，這個轉變如果放在唐宋變革期的問題上來說，我們也可以延續到像剛剛黃先生所講的，北宋初期士大夫地位的改變，還有士大夫跟皇權的關係。從政治角度統治階層變動上來看唐宋的變革。

另外一個是新的路線，就是文化史處理的方式，文化史的處理方式，相對於前面介紹日本學界跟大陸學界所做的工作來說，是我們在臺灣所發展出來的新路子，就像傅樂成先生、羅聯添先生，傅樂成先生講「唐型宋型文化」，羅先生也接著講，但是他可能又覺得所謂文化的類型這個講法不安心，所以他沒有採取這樣的類型說，而嘗試用唐人喜歡牡丹、宋人喜歡梅花等等這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唐代文化跟宋代文化是怎樣的不一樣，這種不同的文化類型之比較，我覺得是臺灣新發展出來的。不過，整個分期理論，跟唐宋具體的分期的認定，在臺灣史學上的討論確實不太多，有一些介紹性的文字，包括對大陸的介紹，像吳安家先生或者是遼耀東先生他們都作過，對日本的介紹，則主要是高明士先生、邱添生先生，可是直接用這些理論對具體的唐宋文化問題的討論，事實上不太多。我在讀博士班的時候，開始嘗試用文化類型、文化史的方式來解釋唐詩跟宋詩。因為從前作詩的人對於唐詩宋詩之分是很在意的，看周契子先生寫過一個溥心畬先生的故事，他說溥先生的詩是不錯的，但是溥先生的詩有個大毛病，因為那是「瞎唐詩」，依晚清人的觀點，唐詩代表很差。但是五四以後的觀點就不一樣了，認為唐詩代表好詩，宋詩代表比較差了。所以在他們老一輩的來講，評的時候說你這詩是唐詩，而且是空唐詩、瞎唐詩，就表示這詩是很爛的，這樣的判斷是風格上的判斷，就是說你這個人這個時代做出來的詩雖然是清朝時候的詩可是它是宋詩，雖是民國時候的人，可是他是唐詩。所以這是一個風格上的判斷。唐、宋詩作為兩種風格類型，在從前是非常普遍的。但這兩種風格類型到底怎麼出現？我們嘗試從文化類型、文化變革上來說明。宋代風格類型的變革是在晚唐文化變遷以後所帶動出來的一種新的風格探索，而逐漸出現這種新的風格型態。這種變革的過程非常的長，從中唐以後逐漸變遷，這變遷要從很多角度來說明，要從社會的角度，要從文化的角度，包括思想與三教的關係，或者從他們對於儒學的不同看法的關係上來做說明。

十多年來對於這些問題，我也做了不少解釋，但總是覺得這十幾二十年來這還是一個大家不是很注意的題目，會覺得做起來也很寂寞，因為相關的東西其實不是

很多，這次爲了應付衣若芬小姐給我的任務，我還拜託朋友幫我清查一下過去十年來相關的博碩士論文，把這些資料通通查出來以後，結果發現沒什麼這方面的研究。可見這個問題，過去雖是一個很熱門的題目，但是到現在大家對這個題目還是不很關心，也使得我們很多唐宋史的研究因爲缺乏這種總體性、通古之變的脈絡性解釋，而在局部性解釋上的很多效力沒辦法突顯，當然局部上我們也會說明，譬如宋代的官制、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它怎樣跟以前不太一樣，但是這些不一樣在很多領域上都有，這些改變有沒有類似性呢？它的改變有沒有一個總體的方向？從官制上說、從權力地位來說，從土地關係，從文學作品詩、詞、戲曲的變動、戲曲的發展，或者從話本，這些零零碎碎的不同，有沒有一個總體的方向，這個總體的方向到底我們要怎麼去解釋它？這總體性方向的解釋，除一個歷史性的解釋之外，到底對於我們文學的研究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意義？就是說做一個文學研究的方法上來說，它可不可能產生一個有意義的方法？我們可不可以通過所謂風格類型的對比，去說明一個文類或者是一群文學現象上它的總體性的特徵，然後從風格的變遷史來討論文化的變遷史，從文化的變遷史來看時代的精神特性？把這些關聯起來看，它有非常多的理論上的、方法上的問題可以探討。所以我在文章後面一部份想說明的就是，這種唐宋變革期史學上的討論，怎麼樣才能從文化史這個領域延伸到文學研究上來。關於文學研究上面，每個人都知道文學發展是有變動的。但對變動的文學史實，我們卻可能有不同的認知態度，例如連續性史觀和不連續性文學史觀。剛剛我們介紹的通史，或者是斷代史，斷出一個時代出來，這些其實它都還是鑲嵌在一個連續性的歷史上來說的，起碼它背後有一個編年的觀念，只是編年中間可能暫時把它斷開，用某個朝代來紀年。但是最近這十幾二十年有新的文學史觀，認爲過去歷史的發展中其實諸多紛紜、錯綜、複雜的面向，它同時聚成。同時聚成許多個別孤立的一些事件，史學家用自己找出來的一條線勉強把它拉起來，就好像我們的文學史一樣，前面是講《詩經》，然後接著講《楚辭》，然後講漢代的古詩、樂府這樣講下來。彷彿認爲它是一條線，其實它可能根本不是一條線，它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各自不同的事，或群峰並峙，或是衆水分流，或者是一團亂絲，然後我們現在勉強把它串起來。講西方哲學史也是這樣，我們總是假設幾個問題是從柏拉圖開始提出來的，後代都在解決這個問題，誰解決多少，解決到什麼程度，後來又接上去，於是串成一條哲學史的脈絡，不連續史觀則認爲根本不是這樣，歷史中存在著許多的斷裂、空隙、矛盾的地方，歷史研究者就是要去說明這個歷史中間的不連續、斷

裂、空隙的點，而不是勉強做一種塗抹的修飾性的功夫，用孔子的話來講，就是「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才是不連續史觀學者最關心的地方，就是要把歷史的空隙彰顯出來，來說明歷史的真相。從這種角度來看，他只關心單一的、個別的孤立現象，而不關心這種連續性的歷史，這個想法當然對近代歷史是一個蠻大的挑戰，可是這也不是新出來的觀點，我在文章中特別舉克羅齊來做例子，克羅齊當時也提出來類似的看法。他說：風格史的討論不應把它編織到社會史裡面，好像藝術作品只是為了解釋社會的進展等等，作為社會史、文化史進展的補充材料。它也不應去編織一個風格演變史。而是天才藝術創作者的作品繫於創作者的特殊人格跟天才的創造，而天才跟天才之間是沒有繼承關係的。他這種講法對於我們現在要講連續性歷史的人是一種方法論的挑戰，你怎樣面對這樣的挑戰？講風格變遷史必須要面對這樣的說明，所以這裡面我有我的處理方式，請各位做參考。我想論文各位都看過了，今天主要的重點應該是討論，不要講太多，重述論文中講過的東西也沒什麼意思，謝謝各位。

衣若芬女士：

謝謝龔教授。我們聽到兩位教授的發言，知道文學跟歷史之間真的是有很大對話的空間。就兩位教授所提出的論文大致的敘述方向，我們發現黃寬重教授是由宏觀而微觀，先為我們陳述了百年以來的宋史研究的情況，而唐宋變革是宋史研究的一個環節，如何實際處理唐宋變革的問題？黃教授認為包括科舉制度、士人、家族，或是教育制度都是可以作為解決歷史問題的一種方式。龔教授所採取的方式是從外而內，先講歷史分期的研究方式，這些歷史的分期研究方式當中有什麼值得參考的部分，其中文化史是不是可以用來解決文學史的問題？在解決文學史的問題當中，關於唐宋變革的部分，美學風格史是不是可以作為另外一種新開闢的路數？我想這些都非常具有啟發性。我們現在就先休息一下，再來進行今天的討論。

衣若芬女士：

還有大約五十多分鐘的時間可以針對今天兩位引言人所談的關於唐宋文化變遷的研究問題，不管是在方法論，或者是在觀念史上的一些發展來進行一些討論。我們特別安排不同的學術領域，一位是歷史，一位是文學的學者，在唐宋變遷這個問題上面，重新思考，期望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方向，或者是發展走

向，現在就把時間開放給各位學者，希望大家提出高見，互相交換您的研究心得。謝謝！

劉苑如女士（本所助研究員）：

各位學者先進，大家好！剛才兩位引言人的發言使我受益良多，引起高度的興趣。尤其是黃寬重教授提到他近年來所專注的研究以及推動的群體研究，都集中在宋代家族與教育方面的研究，很可惜因時間的限制，無法在這個會議上將其長時間研究的精華做進一步的發揮。我希望藉著提問的方式，再撥出一些時間，請黃教授對這一方面作一些補充。

「世變中的文學世界」這個計畫是一個長期跨時空的研究，從魏晉南北朝、歷晚唐五代至北宋，到晚明、晚清，異代的對照正可見其「變」與「不變」的軌跡。根據魏晉南北朝研究的經驗，「士族」乃是當時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架構，與黃教授剛剛輕描淡寫間提到有關宋代家族的幾個點，似乎都可以形成對照作用，譬如黃教授強調當時的科舉跟南朝九品中正選官的不同；還有南朝比較著重於家學等。而宋代科舉、教育跟南朝的選官、家學究竟產生什麼樣不同的影響？以及其他還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希望黃教授有更多的發揮。

再則，黃教授提出電子文獻的使用，以您個人在宋代士人家族研究方面的經驗，在使用電子文獻時是不是注意到關鍵詞使用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掌握該時期典籍共同關切的議題？另外，Raymond Williams 在《文化與社會》的導論中，提到工業、民主、階級、藝術、文化等關鍵詞，從這些詞義指涉的變遷審看廣大生活與思想的變遷；在文史哲的領域裡，也有觀念史研究的趨勢，譬如張立文先生以天、人、理、道等觀念，用以貫串中國歷代哲學思想研究，分析各個時段對這些詞義的理解與生發。在您家族史的研究上，是否也有類似的嘗試？發現若干重要的關鍵詞可以適當的表述宋代家族觀念的變遷？這是我個人非常感興趣的問題，希望黃教授給予指教。

黃寬重先生：

我想對這兩個問題做一個簡單的報告、說明。我先說第二點電子文獻的部份。說實在的，我講這句話的時候非常心虛，但是我不得不講，第一是我看到未來的方向，如果不在這裡提醒各位人文學者，以後可能會在競爭上吃虧，當然這是指一般

現象，對大才像龔教授可能是例外。我說心虛，就是我名義上是本院漢籍電子文獻協調會的召集人，但是到現在為止，我還不會用電腦，我的狀況跟龔教授是很接近的，我的研究全部是自己從文獻上一個字一個字看出來的，跟資料庫都沒有關係，這是我發現我要吃大虧的地方，所以我要先呼籲以後的研究者，如果沒有善用電子文獻資料的話，可能在研究議題，或者超越斷代的研究很難進行。我知道有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國外的學者，善用電子文獻蒐集資料，寫了不少文章。前幾天在一個會中，一位同事他說用本院所開發的電子文獻，以三天的時間寫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這在寫作上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似乎在學界內未形成習慣，仍採用傳統的方式，相當可惜。但是，我並不認為利用資料庫是唯一研究的途徑，用關鍵字查索的結果，會把史實給割裂掉了，你看不到前後面的東西。你用了兩個關鍵字，以為就解決所有重要的問題，其實背後的因素反而被忽略掉了，事件、事務只是孤立的被提出來討論而已，所以雖然我強調電子資料庫對研究的重要性，卻並不認為是唯一的路。在家族史的研究方面，誠如我剛才所強調的，我的研究對象一直是南宋，南宋跟南朝還是有很多差別的，我只能說南宋，沒辦法說南朝，宋代跟唐代在家族結構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這方面龔教授以前研究族譜時也寫過一些文章，不過我自己是一個膽小的人，沒辦法提大問題，我們進行的研究方式，都是用個案的，而以對比的方式來討論這些問題，希望藉著綜合不同個案的結果來看一個比較大的趨勢。這樣做法也許是個性使然，也許與我所處的傳統有關，從臺大到史語所都有這種情況。唐宋之間家族有很大的不同，科舉考試是造成家族不同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在科舉考試的研究方面，以前跟現在也有不同，以前早在 1957 年，芝加哥大學教授克拉契 (E. A. Kracke) 提出社會流動來解釋科舉社會，說明宋代是一個開放性的社會，後來費城大學赫若貝 (R. Hartwell) 教授檢討此一說法，發現宋代的社會並不是那麼開放，所謂不開放，是指中國人的家族透過婚姻的安排，擴展它的網絡，如果父親沒有考上進士，也許叔叔或伯伯，甚至姨丈考上進士，這種網絡的伸張，使社會競爭的機會相對減少，形成封閉性的社會，這種網絡的伸張，使得社會上具有優勢的人會盡量想辦法維持他的優勢，所以整個社會也就不見得是那麼開放。後來哥倫比亞大學的羅伯漢斯 (R. Hymes) 更提出南北宋家族發展不同的論點，認為北宋的婚姻圈比較寬廣，他的活動範圍、關懷的事務都比南宋大。我們的研究，只是一個很小的部分，第一，我們注意到科舉考試對家族的衝擊，其結果是家族設法因應科舉環境。發現宋代的小康之家起來以後，眼見考上科舉之後可以當

官，擁有社會地位，家族既要往上衝，逐漸出現策略性的安排，科舉考試是一個很長遠的大投資，一般的平民百姓不太可能讓孩子去讀書的，要到了小康的時候，才有條件安排一個小孩去讀書，其他人或者做生意，或者是耕田，形成所謂「耕讀傳家」的傳統，這個小孩透過教育、通過考試成了官員，這個家族的社會地位就隨之上升，然後他們就慢慢經營地方上的人際網絡，有些人甚至開設一個書塾、家塾，把附近比較年輕的才智之士集中在這裡，與自家的小孩唸書，這對自己，對整個鄉里都有好處，有利於家族經營一個大的發展環境，成為開展人際網絡的重要因素。社會地位晉升以後，這個家族更注意到有利於發展的策略性安排，第一是進行聯婚，開始注意吸引更有潛力的人，以避免這個家族沒落，所以婚姻在維繫家族地位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宋代有所謂的榜下捉婿的風氣，進士放榜時大官帶著漂亮的小姐去找年輕的進士結婚，這個聯婚，關係著宋代優勢家族地位的維持。新興的家族為了晉升，也樂意做這樣的事情，因此就常常發現有新科進士背叛太太，或者發生報應的故事。不過，這種婚姻關係並不是絕對的有利，尤其是政治婚姻，你看錢惟演跟丁謂家族的婚姻就會受到政治的牽連。宋代官員有很多避親、避籍的制度，親戚不能與你在同一個單位，或者在一個地方做官，可見政治聯婚並不必然保障這些家族，尤其是一個政治人物。所以一般的家族最重視的，還是教育，而教育也是家族社會地位升降的重要關鍵。以前我們似乎太看重科舉考試的重要性，實際上也應該注意蔭補對宋代社會的影響。首先，以前的人認為蔭補沒有辦法當高官，確是事實，但是蔭補的人在特定時期、特定地方還是可以當到高官，而不是整個宋代都不能當到高官。第二是蔭補者在家鄉就擁有優勢，他們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加上有古董、藝文資料蒐集的興趣，對地區文化的推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一般新興的士人重視個人地位的爭取，與蔭補者重視的層面不一樣，所以我覺得要了解宋代基層社會，也要注意受惠於蔭補制度的這一批人，在社會、鄉里的角色，這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現象。而且會特別注意到區域間的不同。剛剛衣小姐跟我談到一個問題，就是宋代主戰、主和跟家族之間的關係，我現在還無法完整答覆，但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宋代的寧波這個地方的人主和的比較多，以前大家討論宋代的主戰、主和問題時，有一些限制，不太願意談主和的問題，也會有貶抑的意味，但是我理解到南宋明州一些大家族主和的原因，是從他們的資料中不斷的強調建炎三年金兵南下對寧波的破壞，讓他們覺得維持現狀可能較為有利，從樓鑰、史浩這些家族留下的記載裡，不斷的強調這一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我想我的研

究其實是鼓勵個案性跟區域性的研究，了解區域之間的不同，對於羅伯漢斯 (R. Hyems) 的一些論點作了修正，但目前還不是到了全面建構一個宋代家族發展體系或說法的時候。我覺得個案的研究有它的重要性，但是不宜長期作下去，作下去的結果好像套公式，看不出更大的東西，所以我們又從個案到區域，然後回頭照顧比較大的時代變化因素。我的報告是很簡單的，沒有辦法跟南朝作比較。

羅宗濤先生（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衣小姐，還有學者各位專家，大家好！剛才聽了兩位主講人及劉小姐的發言我獲益良多。而最高興的一點是，我本來以為在國文學術界只有我一個人不會用電腦，現在連黃先生都不會用，龔先生看起來是根本不用，心裡覺得很安慰，才敢將這件事說出來。關於電子文獻，我個人是不會使用，剛才劉小姐提到關鍵詞的問題，聽起來她是比較內行，而我的推想是比較膚淺，就是關於字頻的檢索，或許對研究會有用。譬如全唐詩、唐宋詩的資料庫建立之後，如果把全唐詩、唐宋詩的字頻拿來觀察、比較、研究，很可能可以看出這中間某些文化現象。剛才先離開的羅鳳珠小姐，我就請她協助提供一點全唐詩的資料，舉例來說，剛才龔先生也提到，羅聯添先生的論文提到牡丹花的事情，就我們先入為主的觀念，唐詩中關於牡丹花的詩應該很多，但是我從全唐詩的字頻的觀察裡，發現其實牡丹花出現的頻率比菊花少了很多，菊花反而多好多倍。此外還有蓮花，蓮花包括荷花、包括菡萏、包括芙蓉，有關蓮花的詩也比牡丹花多。不過這當中我們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剛剛黃先生也一再提到，就是我們不能光以量來看，因為寫菊花的詩我全部讀一遍，寫蓮花的詩我也都讀過，但是就是沒有舉國若狂的情形出現，而寫牡丹的詩雖然比前兩者少，但是它的氣勢很盛，因此不能光看數據來寫文章，因為會有相當多的問題在裡面。我再說一下我的心得，我觀察全唐詩裡的字頻發現從中可以看出某一些語言，或是某一些觀念，或生活的變遷。有一些字我們在經書中讀過，它們在《論語》、《左傳》中經常出現，可是到了全唐詩裡面就很少出現，所以有很多我們以為很平常的字，事實上它就慢慢的越來越少。還有一些字，當時很少見，可是到後來的通俗文學裡面卻大量出現。因此我就想向大家請教，是不是可以從字頻看出到底哪一些觀念，比方說佛道的問題，還是某些觀念它是怎麼變成理學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從這些細節來觀察。當然我想除了字頻之外，若干重要的關鍵詞，後來就變成一個詞彙的問題，或者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整首詩，或者是一個人所有的詩，或者整個

時代的詩，可能和風格、風尚的一些問題有關，這個想法是不是可行，請各位指教，也不要笑我無知。謝謝！

衣若芬女士：

剛好黃教授與羅教授接續著都在談電子文獻資料一些的問題，下一次的座談會正是安排這個主題，我們會邀請羅教授方才提到的元智大學羅鳳珠教授來談一談她所建立的「唐宋代文史綜合研究資料中心」，時間是 12 月 7 號下午的 2 點半開始。

羅宗濤先生：

我跟羅鳳珠小姐曾有接觸，她在技術層面的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對學術界提供了很多幫助，但是關於這資料庫可以怎麼用，能發生什麼作用，恐怕超出她的能力範圍，所以這個恐怕要大家共同來討論，而且在討論的過程當中，可能還可以給羅鳳珠小姐一些啓發，她都是這麼客氣的說。謝謝！

王德毅先生（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謝謝！貴所邀我來參加唐宋文化變遷之研究座談會，今天出席之學者，十之九以上皆是中文系所的教授和中文所的博士，歷史系的只有引言人黃教授和我兩人，所以我願在此提出研究宋史者之觀點，謹向大家請教。

一、有關唐宋變革期之研究，師大邱添生教授寫過三篇論文〈唐宋變革期研究〉，他的很多論點是從佐伯富先生論文參考來的，在師大學報、大陸雜誌發表過，他曾從政治型態、貨幣經濟、田制與稅法看唐宋間的歷史變遷，又有一文為〈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皆可參考。我個人的研究是社會救濟，黃先生談到福利方面的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發揚歷史的光明面，不要學大陸學者講農民起義，階級鬥爭等等，我覺得歷史應該是很善的、很活的、人與人是很相愛的，而不是一天到晚你死我活的一些鬥爭。所以我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宋代財政的問題。宋代為什麼沒有發生像唐末黃巢之亂這麼大的動亂？因為他有些政策做得蠻好的，社會福利蠻周備的，這樣的政治我想是相當符合儒家的要求，為民服務，民胞物與的觀念。我也討論到宋代的租稅，宋代的役法等方面。我在民國五十年代就做宋代史學的研究，宋代史學特別盛，如果我們研究史學史把宋代切斷的話，我們就會覺得中

國史學減少很多的光輝，梁任公先生也很推崇宋朝的史學，他說中國歷史上兩位姓司馬的：一為漢代司馬遷，一為宋代司馬光，都對我們中國史學產生很弘遠的影響。司馬光對歷代史中的很多記載，凡屬虛誕、離奇、誇大的他都不採信，他在《資治通鑑》裡面不書奇節和文人，又批評縱橫家言是騙人的，認為治國要講信義，不可上下交相騙，可見他從善的一面寫歷史，他不是選社會的黑暗面，他是戒亂，戒亂等於我們防病，沒有病就等於健康，沒有亂就是治。

二、唐宋開國背景不同，故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唐承隋朝大一統之後，故強大；宋承五代分裂之後，故弱小。唐臣銳於立事，宋臣勇於求退。惟宋人對唐代政治社會有一些反省，史家好評論唐事以為鑑戒，如評唐太宗玄武門之變，有違父子之親，手足之義；更批判女主禍國，宮廷不嚴，宦官亂政，朋黨爭權，藩鎮割據，大臣失節等，皆有背《春秋》人倫之教。宋則重建政治倫理與社會道德，並重視防微杜漸，所以宋代士大夫的道德觀念比唐重。宋代史學比唐代興盛，宋代史家重視當代史的纂修，本《春秋》大義以立言，史書中的義理觀念特強，又創新史體，對後世史學發展影響深遠，這是宋代學術成就超過唐代者。由文化變遷看不同朝代的價值觀，也有其意義。

我是研究歷史的，講這個歷史的變遷，我不太習慣用愛什麼牡丹、蓮花啦！我也喜歡詩，喜歡詞，甚至小說，我都喜歡，但是我在寫我的文章裡面很少引用詩詞資料，也可以說是我的缺陷。我想我跟中文系的好朋友在一起，受的益是很多，今天非常謝謝衣小姐邀請我來參加，因為禮拜五我沒有課，其他時間恐怕就沒有辦法了。謝謝！有這個機會能表達我的看法，耽誤很多時間，非常對不起，再謝謝。

李豐楙先生（本所研究員）：

今天我們這個討論方向是放在唐宋文化的變遷，不過記得剛開始在設計的時候，對於「世變」的部分，一直是很強調變亂的時代，是不是我們也應該考慮，在北宋末期到遼、金、元這一段，在整個文學方面的變遷，也可以做一個比較關乎「世變」與「文變」的思考。我想如果關心文學的改變部分，特別是類似像元雜劇的形成，或者是相關的通俗文學，大概都會承認在金、元這段時間，正是所謂「變」的重要關鍵，它牽涉到寬重兄對遼史、金史與蒙古這一段的研究。寬重兄今天提的比較少的是他原來最專長的忠義民兵的部分，我想類似這樣的問題，在當時淪陷的北方，或者是在「征服王朝」所統治的北方，這樣一個鉅大的變亂，對於北方

的家族或者是文人，必形成許多的改變。一般在研究雜劇的大概都承認：爲什麼有很多的文人會去從事這種雜劇的創作，而且這些雜劇流行的區域，在劇作家的劇作上大概有很多與金元統治下仕途的改變有密切的關係，最明顯的例子譬如這段時間裡宗教的問題，這一點在過去方豪教授的研究裡就曾經企圖要做，不過在我們上課的那時候方先生就說：這個問題太複雜了，我只能夠處理一個基本的部分，其他就沒辦法處理。鼓勵我可以寫個報告，後來我寫的報告就是選擇這一段，討論金元時期宗教改變的影響，因爲在整個文化層面裡，這個時期儒、釋、道三教之間的宗教思想的改變都有影響文學之處，事實上這確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在整個文化的變遷裡，這些都是比較本源性的。元遺山在金亡的時候寫過不少篇序，他就特別提到在金亡的時候，北方十分天下有二、三都是全真教徒，如果我們根據人口比例來看這是很高的，當然元遺山在金亡的時候這樣講，可能是基於一種悲憤，所以他講的當然很難統計，但是我們可以想像有五方之一的人口是與宗教有關係，如果從這樣一個「世變」的角度去解釋，爲什麼元雜劇裡「神仙道化」劇一直佔著最高的比例，就可以想像這一段時間「世變」與「文變」的關係。所以我想我們在第一個論題裡面，談六朝的時候就特別討論到宗教形成與文變的關係。不管是佛教或是當時的新興宗教，在整個宋、金、元的變革時期，它對於人性與社會是一種文化的機制，我想我們在討論這一段時，除了從文化變遷那麼大角度來談之外，有時候也必須要很具體的從一些比較確實的角度觀察，就可以觀察出一些訊息。否則對於元雜劇的興起就很難把它放在今天所討論的這種文化變遷中來討論。我想我們在談文化的時候，應該是要更多元的，或者找出更具體的某一些現象來做觀察。

黃寬重先生：

我簡單的說一下，因爲李教授談的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文學跟歷史可以有交集，但是被忽略的一個問題。我是做南宋歷史的，我的主要討論點就是從義軍到地方勢力，從我角度可以觀察到：時間的演變對於人民或知識份子的影響也是有變化的。譬如說，南宋到宋孝宗以後，北方的人跟南方的人對南方宋政權的看法已經有所改變，對宋、金政權的態度已經有所調整，陸游就很清楚的提到，北方這些義軍要到南方，表面上都強調春秋大義，其主要的目的在獲取宋對於北方人的支持，但在時勢變化下，南方人對這批人的看法也有改變，接待方式也有所不同。所以一個政權統治超過四十年，當地的人對於新政權的認同跟舊政權的關

係要有所區別，在這種情況之下，南宋的人自然有些不同的回應，所以我覺得文學上的反映跟現實的環境有關係。其實和戰與尊王攘夷的觀念在南宋的變化及其扮演的角色，同樣值得進一步去思考，並不是所有宋人都是主戰的，也有階段性的不同，當時在形式上存在著這樣的一個現象：北人主軍、南人主政，所以南北人對於現實環境有不同的了解，很值得我們去觀察。在這種環境下很多從北方來的文人不能適應，或者被歧視，是很自然的事，這些現象都有助於了解這些南來文人的心情和文風。另外，我處理到南宋最晚期幾個在變亂中突然崛起的人物，如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李全與李壇父子，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李全在金快要滅亡之前依附南宋，表面提出來是春秋大義，要歸順宋王朝，其實是爲了生存發展。到了蒙古聲勢大振，李全轉而附蒙；等到最後，他的兒子李壇卻反過來抗蒙古投宋，都是考量現實的政治利益。所以，人其實有很理想的一面，也有現實的一面，而現實面常常勝於理想面。宋金之間交界的地方性武力，如兩淮山水寨，表面看來這種邊界性的人民抗敵性最強，其實他們的妥協性、游離性也很強，也是走私貿易的推動者，並不能用很簡單的想法，認爲這些人效忠宋朝，所以我覺得研究歷史要回歸資料與現實。謝謝！

楊承祖先生（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來參加會議，碰到王德毅先生，我就說：早知道今天主要是討論宋朝的事情，我就不敢來了。不過龔先生講的比較接觸到文學，雖然剛才王先生講文學的人來的比較多，可是我們今天談的問題倒不全然，像羅宗濤先生講的無所謂文學或歷史，他提到用電腦詞彙的方法。我來的時候得到的通知是集中討論研究文學創作跟社會政治的輻輳關係，特別是討論朝代更迭裡面文人的心態、文學創作、文學詮釋、文化伸展與文化傳播的問題，這是我個人非常有興趣的，所以我就趕來參加。講到要選擇一個重大世變的時期，可以講晚唐五代；既然談到宋，尤其是南宋，那麼北宋的覆亡，以及南宋最後滅亡於純粹異族的元朝人，像這些問題的確是我們應該研究的。我覺得站在文學的立場是要看看文人在重大的世變之際怎樣安身立命，矢志居心，創作怎樣的作品，對當時以及後來人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者我們怎樣去讀這些作品。這是我覺得今天的命題非常有意思的。

剛才聽到幾位的意見，我有幾點想提出來，或者是同意前面幾位先生，或者是強調他們的意見：首先，我覺得要用電腦。我也是一個不會用電腦的人，不過我現

在繳文章的時候，請學生幫我打電腦，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以前要抄好幾天，現在只要幾個鐘頭，而且修改也極其容易。關於用電腦找詞彙關鍵字，我覺得非常有用，某些文辭深入統計的研討也是很有意思的。最近常常看到很多人寫文章，尤其是政論，用到「弔詭」，這是《莊子》裡面的，我讀古文家的文章裡面似乎沒有見到「弔詭」這個詞的，今天的現實讓大家覺得是有用這個詞來表達的必要。但是我也感覺到有時候電腦或是其他的統計方式都有所不足，因為有的時候不是某一個詞彙，甚至某一個現象能看出作品裡面的意義來，譬如說一篇文章裡沒有某些詞彙和字面，但另有表達的方式，比方像曾鞏寫〈唐論〉，他實際上是爲了王安石吧！但是文章裡面沒有一句話提到宋朝，也沒有提到王安石。從前的文章家都講這篇文章實際上是爲王安石而發。我自己的研究講到杜甫寫〈爲王閬州論巴蜀安危表〉裡面也沒有一個字提到嚴武等，但是我分析以後，發現和嚴武、房琯集團的政治活動有關係，而且對了解杜甫的影響很大，像這種情形就不是從字面上可以知道的，因此我覺得做文學作品研究的人，要對作品的深層多加研析。

其次，亡國之際的文學作品的研讀是一個蠻重要的課題，我記得有一位前輩，已過世了——孫克寬先生，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韓偓，因為韓偓一般都被認爲是晚唐時期的唯美文人，他做到中央最重要的相職，眼見國亡，在國亡以後能夠脫身到福建來；他的作品表面上的確是很香豔，但是實際上裡面有很深層的痛苦與悲哀，如果沒有研究工作者去探究我們不會知道。對衰世亡國文人的作品研究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文人在這個問題當中的反應，文人怎樣處亂世、怎樣傷亡國，以及他們是否仕新朝是要深入探察的。有的人屈事新朝，我們說他們是漢奸，但是每個情況不太相同，有的人叫識時務者爲俊傑，這是研討文人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尤其是在動亂，就像民國以來都是很動亂的時期。的確我們討論文學或歷史不能像從前人那麼判然，說某某人是忠，某某人是奸就完了，因為有很多人物的歷史評價會因立場而異，或者很久以後我們才看清楚他們的面目，了解他們的深心。所以我個人覺得在今天要研究文學，有的時候應該要想辦法深入。

再者，就是宋代以下的都市文化以及平民社會興起以後，我們有所謂通俗或者庶民文學的發展，小說與戲曲，這方面的研究非常之重要。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工作，也是剛剛王先生所提到的，我們應該要把通俗文學要跟雅正文學（或者叫典雅文學）作品串起來，這在明代以後尤其像湯若士他們這些人，那就很明顯，他們絕對是高級的文人，但是他們有絕對新的文類的創作與寫作，這裡面有很多的寄託，

不管是對社會對政治都有可探討的。

總之，我覺得作文學工作的人，也要多利用歷史研究的成績，學習研究歷史的方法。當然，我更想強調一點，就是對文詞深入研究，這是我們作文學研究工作者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衣若芬女士：

謝謝楊承祖教授。不曉得龔教授對今天的討論有沒有需要補充的地方？

龔鵬程先生：

因為沒什麼人來討論我所談的這個部份，所以我實在不必講了。不過假如有一些時間，我願意再針對分期法做一些補充性的說明。一是對分期法的介紹。請注意，分期跟我們一般所談的朝代差異是不一樣的，就是說我們現在談的唐宋文化變遷，如果放在我所談的這個脈絡裡，那就不是在談宋朝跟唐朝的不同，是在談唐文化類型與跟宋朝文化這種類型的不同，宋代文化類型可以往上延伸到唐朝中期，如果這麼講，唐朝中期以後的文化就不是唐代的文化了，這就是它複雜的地方，「唐詩」、「宋詩」為什麼在這個地爭論不休呢？就因為唐人寫了很多宋詩，宋朝人寫了很多唐詩，此話怎講呢？說唐人寫了很多宋詩，那個「宋詩」是指風格類型，所以杜甫、韓愈等等都被認為是宋代類型的詩，此即唐人寫了很多宋詩。宋人寫了很多唐詩，則是說宋朝人寫了很多詩，我們認為是可以代表唐代風格的那種詩，接近於王、孟，譬如九僧、四靈等等，這是宋代的唐詩。所以第一個要澄清的，是我並不是談朝代的差異，而是談分期的差異。第二，分期代表我們欲通古今之變，它是歷史上的大變化，不是小變化，跟一般講的世變並不一樣。分期法談的是世變中的大變化，而不是一般小變化。譬如南宋跟北宋的差異，當然是有，但是這個差異小，包括南北朝，譬如說東晉、西晉這個差異也小。隋唐統一天下，跟南北朝的分裂，這個差異也小。即使是漢代到魏晉之間我們平常認為是很大的變化了，在談論歷史變動的時候，都會覺得這個變化小於唐宋的變化，唐宋的變化更大，就像我們常常說清朝末年鴉片戰爭以來到五四運動這個叫做「天翻地覆的大變局」。什麼叫天翻地覆呢？它影響到幾個方面，第一就是社會結構的徹底改變，注意結構一詞，生產的方式不一樣、社會組織型態不同、整個政治權力的結構不一樣、官制統治系統的不同，這些都屬於社會結構的不同。其次，是價值統體系不一樣。這個社會中

人他認為最好的價值、價值標準，乃至於價值的序列方式都不一樣。這不一樣影響到人跟人的相處關係，人的社會價值觀，譬如過去我們覺得父母親很重要，要孝順；現在則倒過來是要孝順小孩。還有夫妻的關係不一樣，人跟人相處的關係不一樣，價值體系不同。我們傳統認為的道德、倫理關係，全面價值體系都不一樣，包括我們對文化的態度也不一樣。三則是文化表現不一樣，所謂文化表現不一樣，就是說過去在某些文化表現是認為最重要的，現在可能不這麼重要，這個時代有一些獨特的表現體，這些表現體即使同樣是詩，現在跟古代的表现也不一樣，這是全面的變動，分期法主要就是要談這個變動。所以他跟一般所謂的朝代分期不同，它成為另外一種分期法。它之所以值得我們重視它，不管它講的對不對，我說這是一種方法，我們應該仔細來看看它。第三，就是分期法它有一個特點，它是通史跟斷代史這兩種歷史方法的一個中介。它的目的是通史性的，就是通古今之變；可是它的手段卻是斷代史的方式，把歷史斷開來處理，斷開來處理，是要來說明歷史的變動。但是歷史是很難斷的，這個地方斷開，你的標準在哪裡？你說這個地方的變動大，那個地方變動小，這個比較是怎麼樣，這就是分期法之所以常常引起重大爭論的地方，它是處於通史跟斷代史的中介。這樣一個方法，它對於我們文學研究者來說，有兩個地方值得我們重視，第一，我們在文學史界都知道，我們過去當然主要用劉大杰的，可是現在似乎還沒有辦法找到更好的對中國文學史總體的敘述，就是說我們現在還在尋找一個新的文學史觀。分期法可能提供了一種線索，幫助我們進行文學「通變」。在《文心雕龍》當時，講通變是「文質代變」，用「文」、「質」這兩個概念，就是漢朝人發展出來的觀念，來說明文學史的變動。現在我們講文學史的變動的時候，假如不用馬克思的、史賓格勒的，我們要用怎樣來的方式說它呢？分期法可能可以提供一部分的協助。第二，我們談文學作品，總要談文學的風格、時代風格，文學風格假如從分期上來講，而不就朝代來說（朝代是個小時代，分期法跨越的時代大），那就有兩種方法來說這個所謂的「時代相」，不同時代的面向。第一種方法就是我剛講的，從社會結構、政治關係、從組織型態上具體的去說，從制度上說。第二種說法就是比較抽象，從精神史的方式、心態史的方式，或者我們談到文化表現風格史的不同，書法、繪畫、戲劇、詩歌等等，它的風格上產生什麼樣的差異，或者是談倫理狀況上有什麼樣的變動。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從精神史、文化史、心態史的幾個不同面向上來說，這樣剛好在說明文學的不同時代相上是有效的。就是我們在解釋文學作品的風格的時候，一方面要去說文學

格式上的不同、字詞表現的不同、文辭表現的不同。一方面也要說，不同的文學作品它所呈現的，它的思想、它的表達的態度是怎樣不一樣。所以我想分期的這種方法，仍是歷史解釋上的方法之一，它可能對我們文學研究也不是完全沒有用處，藉這個機會鄭重向各位推薦，謝謝各位。

衣若芬女士：

謝謝黃教授和龔教授。由於這是一系列的座談會，整個主題是集中在世局的變動，包括朝代、社會、政治變動對於文學創化的關係，選擇的是幾個可能在中國的文化或文學的發展過程當中非常具有影響力，或者具有震撼力的關鍵時期，包括：魏晉南北朝、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以及接下來的晚明與晚清。以今天座談會為例，我們是以唐宋變革作為引申，來探討文學史的研究方法上可以有什麼樣的新開創。黃教授談的是關於學科整合或學科對話的問題，剛剛李豐楙教授也提出以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是歷史上發生重大變化的實例作為文學產生的原動力，探討其內在作用力對於文學寫作方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方向。龔教授提出分期的方法，超越了通史和斷代史的研究方式，以美學風格史、文化精神史的角度來探索文學問題。此外，我們今天又提到在面臨新的科技衝擊的時代，我們怎樣去利用已經做成的資料成果，來加強或補充我們資料的蒐集，也就是電子文獻可能可以為我們帶來的一些幫助，但是電子文獻它本身也有一些缺失的部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打算留在下一次的座談會當中再進一步的探索。我們下一次座談會的時間是12月7號星期一下午2點半，同樣是在文哲所二樓這個會議室，歡迎大家屆時再度蒞臨，謝謝各位。